

這代人的 香港民生影像 1950-1970 的街角

鍾文略 攝影

周佳榮 鍾寶賢 黃文江 編撰



這代人的街角

香港民生影像 1950-1970

鍾文略 攝影 周佳榮 鍾寶賢 黃文江 編撰

商務印書館

這代人的街角 香港民生影像 1950 - 1970

攝影：鍾文略

編撰：周佳榮 鍾寶賢 黃文江

責任編輯：張宇程

封面設計：楊愛文
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刷：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14字樓

版次：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© 2015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ISBN 978 962 07 5650 4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

序

觀看之道

——鍾文略的民生故影

二十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民生，在英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下，是怎個樣子存活過來的？文字紀錄往往缺席，偶有留存，也瑣碎模糊。這所謂借來時間的身世失記，要從頭細認，十分艱難。

幸好，攝影，這一項視覺媒體藝術，早在香港發展得很成熟，其中有一羣關注人生某一層面的攝影家，基於對現實生活的社會關懷，憑一雙利眼，選擇平常主題作拍攝對象，為香港留下事件影像，鍾文略先生是重要一員。

《戰後香港軌迹 —— 民生苦樂》、《戰後香港軌迹 —— 社會掠影》、《往事只能回味 —— 鍾文略攝影集》等鍾先生攝影作品的出版，正如蘇珊·桑塔格 (Susan Sontag) 所說：“不只是一種影像，還是對真實生活的一種詮釋。” 這些展示了香港身世的資料，曾帶給我們珍貴的回溯機會。

鍾先生今年 90 歲，他的兒子鍾燦光，把他的民生故影作品，從新整理出版，並作父子對話。兩代人的話語感情接軌，正顯示一種親情與歷史的傳承。

許多作品，我從前看過，且感動過。幾十年後，我再細細凝視頁頁的照片，仍彷彿悄悄緊貼鍾老先生當年 —— 五十、六十年代某一天、某一刻，舉起相機的那一瞬，抓住了某一個香港人的生活細節，恍然，原來香港是這樣走過來的。

我不懂攝影技巧，不理解光影效果，卻想談談對這本攝影集的觀看之道。

只因曾經有個青年人指着些照片，驚訝又疑惑的問我：“咦？怎麼當年的孩子都沒穿鞋子的？怎麼都赤裸身體的？是攝影師刻意選材，想利用畫面產生煽情效果嗎？”我凝視一張又一張照片，視點聚焦在不同情節上。熟識的水桶陣、“三斤頂二斤”的一家大細，至於那些赤腳、裸露身體，更是當年習以為常的觀看點。我從沒有那青年的驚訝與疑惑，因為那是當時社會真實情況。我還算幸運，不必如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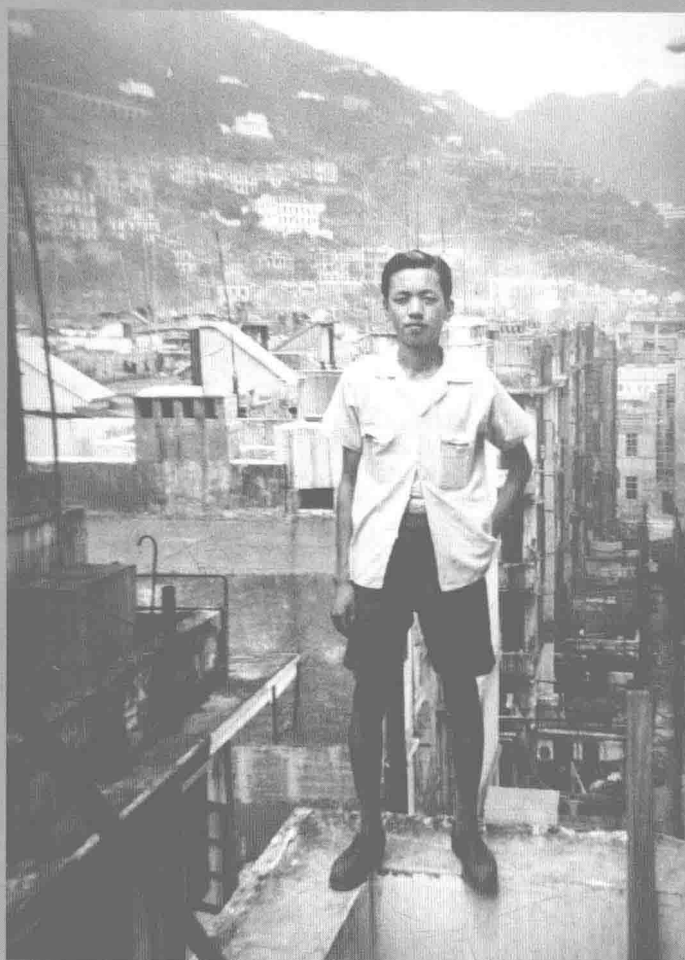
們般活着，但卻清晰知道那是真實存在過。今天重新觀看，方才體認當年他人是實實在在的，並非瞬間痛苦。當然，整個社會不單只有他們一羣，可是他們應屬大多數，故攝影師隨時隨地便能捕捉許多意味深長的畫面。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指出：“照片變成歷史事件標準證據，並隱含政治意義”，那也值得考慮。“政治意義”，包括了社會文化意識、經濟狀態、攝影師的責任、良心。因此，我們觀看之道，必須如同攝影師當時的取材用心，反省照片中的含意。我常常記着蘇珊·桑塔格另一段話：“照片在教導我們新的視覺準則的同時，也改變並擴大我們對甚麼才值得看和我們有權利去看甚麼的觀念。照片是一種觀看的語法，更重要的，是一種觀看的倫理學。”

當年“攝影”是“貴重”行為，攝影機、膠卷、沖曬等等都價值不菲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消費得起。且讀讀鍾老先生的回憶就知道。那麼艱難才買得一具相機，必珍視每按一下快門，每一張菲林。並非今天用智能手機的人，胡亂拍了又拍，輕易又刪除那麼輕率。還有利用科技電腦加工，足可以假亂真。鍾老先生說：“今昔攝影確有很大的不同，通過電腦可以做到過去做不到的東西，但這樣又容易出現無中生有的情況。……完全扭曲了當時的真實景象，這違背了我的攝影理念。”正是真切的說明。觀看這本攝影冊，我想必須理解當年的攝影師忠實的審美和不刻意求工的要求，也該試尋求影像之外的一番心意。

香港人，是這樣艱辛、努力走過來的。

小思

2015年4月24日



鍾文略1947年初到香港工作，於灣仔東方戲院天台留影。

攝影師簡介

鍾文略

1925 年生於廣東省新會縣。1947 年來港後，從事戲院電影廣告畫繪畫工作，工餘時自學攝影。

1958 年在《新晚報》舉辦的“普魯士菲林攝影比賽”中獲得攝影獎，自此屢獲殊榮，包括香港國際沙龍銀像獎、香港攝影學會甲組月賽等攝影獎項。後獲香港攝影學會授予初級會士及高級會士名銜。

1963 年起成為電影公司全職攝影師，並任《攝影新潮》雜誌主編。1968 年起自立門戶，從事攝影及沖印業務。1991 年起退休。

退休後多次舉辦攝影展。曾出版攝影作品集包括：《從業餘到職業》、《戰後香港軌跡—社會掠影》、《戰後香港軌跡—民生苦樂》、《香港不了情》、《歲月留痕》、《往事只能回味》等。

1999 年獲香港攝影學會授予榮譽高級會士名銜。

鍾氏攝影風格帶有藝術感，並喜愛以平民百姓為拍攝對象，滿載感情。

編者簡介

周佳榮

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。專研東亞國家現代化、中日關係及近代中國思想史。著作包括：《潮州商會九十年發展史》、《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》、《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》等。

鍾寶賢

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。專研社會及經濟史、商業史、商業法律及習俗史及南中國、東南亞及中東貿易僑民。著作包括：《香港影視業百年》、《商城故事—銅鑼灣百年變遷》等。

黃文江

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。專研香港公共健康史、中國基督教及傳教士史及晚清至民國初期中國史。著作包括：《王韜與近代世界》(合著)、《法流十道—近代中國基督教區域史研究》(合著)等。



目錄

序：觀看之道

——鍾文略的民生故影 小恩

iv

寫在前面：從業餘到專業的攝影人生

1

一、艱苦歲月

9

二、各行各業

43

三、老少娛樂

79

四、節日慶典

107

五、房屋建設

129

六、交通運輸

149

七、香港島發展

163

八、九龍及新界發展

187

鍾文略、鍾燦光父子對談

199

攝影師簡介、編者簡介

205

寫在前面

從業餘到專業的攝影人生

鍾文略 1925 年於廣東省新會縣雙水鎮萌頭村出生，小時候母親早逝，沒得到父親照料，就與祖母一起在農村生活。鍾文略十多歲時，內地適逢抗戰時期，生活十分艱苦。當時他唸至小學四年級就被迫輟學，為了謀生，只好在村裏造木屐和耕種。抗戰勝利後的 1947 年，因為國內生活實在艱苦，二十出頭的鍾文略便跟隨一位“水客”（當時稱為“巡城馬”，類似郵差及速遞服務員）到香港找尋工作機會，希望能由學徒做起，學成一門能賴以維生的手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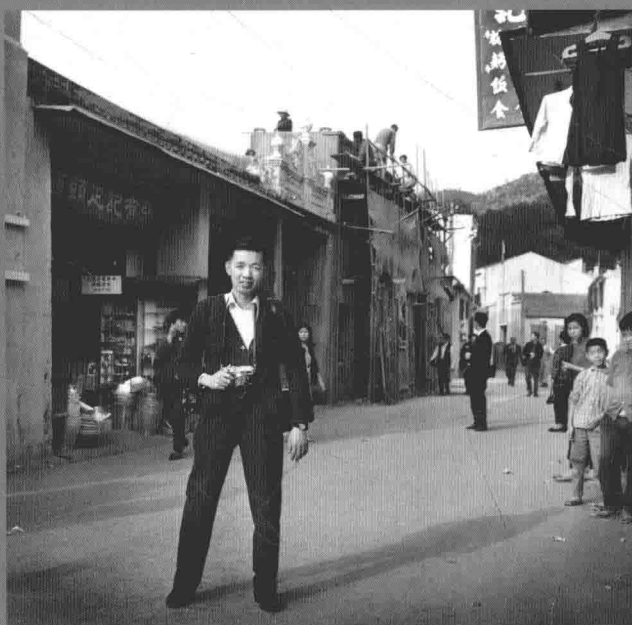
和平後的香港，百廢待興，找工作也不如想像中容易，鍾文略最後由他父親的朋友介紹，在戲院美術部當上學徒，負責繪畫美術廣告畫。這份工作一做就是八年，他從中掌握了油漆、裝修技術，學懂如何繪畫廣告牌、月餅宣傳畫，以及戲院電影上映的廣告畫。1955 年，30 歲的鍾文略轉職到灣仔國民戲院工作，負責設計電影廣告畫。當時正值粵語片流行的時代，一套電影放映時間很長，所以他只在戲院換畫的時候才會比較忙一點。因為公司不允許找兼職，自己又沒有甚麼嗜好，所以平常時間較為清閒。不過，在長期接觸電影劇照及明星照片的情況下，鍾文略對攝影的興趣開始萌生。

初時，鍾文略的月薪只有幾十元，要購買一部夢寐以求的相機，對於已成家立室並育有一名小孩的他來說，簡直是一種奢望。但這阻擋不了他對攝影的熱情。他於是用僅有的積蓄，購買大量攝影專業書籍，在工作之餘鑽研攝影，同時向朋友借用相機操練技術。他採取“以戰養戰”的方法，用借來的相機在街上四處拍攝，再寄到報社賺取稿費，或參加攝影比賽。當時每卷 120 菲林售 1.25 元，鍾文略有時候一個早上便能拍一兩卷，對於經濟條件不充裕的他也是項頗大的開支，相片拍完後也只能交到平價的沖曬店沖曬。

鍾文略學習攝影是無師自通，自己摸索，及至 1956 年，他有感攝影知識的局限，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美術老師，教他沖曬技術；又認識了一位曾經經營沖曬店的朋友，介紹他加入“香港華人文員協會”的攝影組，當時是由羅漢功和麥峰兩位前輩擔任導師。因為攝影組設有“黑房”，不滿足於外頭沖曬店品質的鍾文略，開始練習親自沖曬相片，他從此也成了“黑房”的常客，常常一大早就到“黑房”放相。



在電影圈任劇照攝影師的生涯，對鍾文略的人生是一大磨練。



鍾文略工作之餘，常到街上尋找拍攝題材，捕捉基層市民的生活面貌。

1957年，鍾文略購入人生的第一部相機。當時專業相機多由西德製造，其中一款“祿來可得”(Rolleicord Vb F3.5)就要索價200元。為了這部西德相機，鍾文略節衣縮食，但因為儲的錢還不夠，要與朋友合資，到購買的一刻甚至還要從剛收到的薪水中先拿一部分支付那部“祿來可得”，為的是那副西德製造的“蔡司鏡頭”。鍾文略用這部相機拍的第一幅照片，就是於花園道兵頭花園(現稱動植物公園)水池中的一株蓮花，相片取名為《花中君子》(見圖1)。這張相片後來給攝影組的同學品評，大家都建議他沖曬成5×7的大小拿去投稿。《青年樂園雜誌》那時就給了他5元稿費，已足夠他買四卷菲林了，之後他又投稿到《大公報》，竟得到15元稿費。同年，他參加了香港攝影學會舉辦的“國際沙龍”並順利入圍。就在那時，鍾文略透過參加比賽認識了身為比賽評委的著名攝影家陳復禮，陳氏在攝影技術方面給予他很多的指導，兩人關係亦師亦友。



圖1《花中君子》

1958年可算是鍾文略攝影生涯的一個重要年份，由這年開始他與攝影結下了終生不解的一份情緣。當年《新晚報》舉辦首屆“普魯士菲林攝影比賽”(Perulz Photo Contest)，獎品豐富，包括名貴相機和相片放大機等，鍾文略得知消息後立即拿起相機，不計題材的四處拍照片，準備拿來參賽。有一次鍾文略大老遠從灣仔跑到香港仔的巴黎農場(現海洋公園所在)拍攝白天鵝，在光線及構圖配合下，他拍攝了《湖裏天鵝》(見圖2)，並用以參加比賽，最後竟得了高級組第三名，這對首次參加比賽的他來說是一大鼓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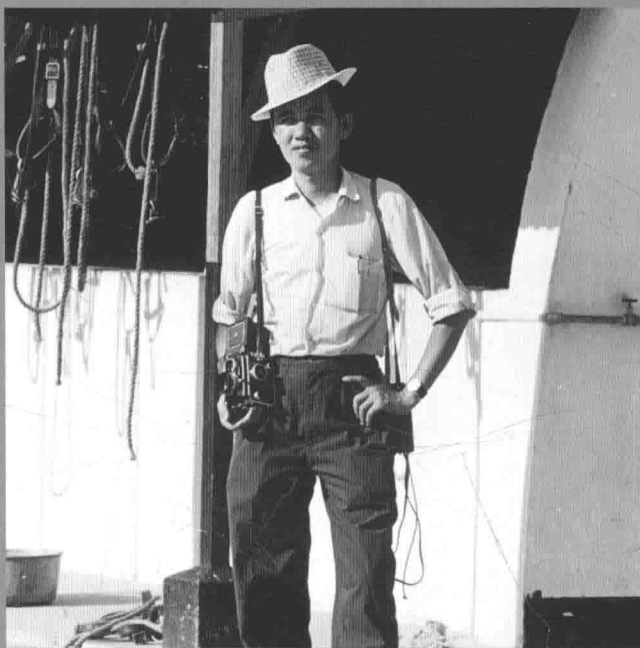
圖2《湖裏天鵝》

又有一次，鍾文略在九龍仔一間學校幫忙粉飾外牆，發覺學校的建築設計十分獨特，於是就約同太太及女同學配合構圖，最後他想到把相機放在樓梯底角落，拍出了三角形構圖的《眺望》(見圖3)，同時又拍了另一張方形構圖的《眺望》(見圖4)。他後來按心意剪裁，把兩張相片都交到攝影比賽參選，結果在高級及初級組別同時取得冠軍。這兩張相片也成為鍾文略一生眾多攝影佳作中的最愛。是次得獎令他對攝影的興趣進一步加深，他開始在拍攝題材上下工夫。

鍾文略加入的“華人文員協會”攝影組，一向注重拍攝寫實題材，他的老前輩曾提醒他，切勿太專注唯美的線條構圖，



1956年在第十四屆香港工展會會場前攝。



鍾文略與他的Rolleicord照相機。

應該拍些有人情味、能流傳後世的相片，這番話激發他深入生活開拓創作領域。於是，他趁上班空閒時間走到街頭捕捉富有人情味的感人畫面。

在五十年代，香港生活艱苦，有關社會對立，暴露勞苦大眾辛勤生活的影像俯拾皆是，當時鍾文略醉心於拍攝這類寫實的題材相片。其中一幅攝於1959年柴灣街頭，名為《食水難》（見本書12頁）的作品，如實反映了當年全港制水，每天只供兩小時的苦況。當年他憑此照片就獲得“國際沙龍”的銀像獎，並經各大報章刊登，公認為最能反映該時代艱辛的一張感人作品。

同一年，鍾文略加入了香港攝影學會，並正式參加該會的甲組月賽，每月需提交三張照片參賽。他在1960年連續兩年得到甲組年賽總冠軍，不久即獲頒授初級會士和高級會士頭銜。後來更獲升為榮譽級會員FPSHK名銜，並擔任月賽評判及“國際沙龍”評判。

鍾文略六十年代仍在戲院工作，但因為熱愛攝影，閒時都會以參加比賽來支持他的攝影興趣。在公開比賽獲獎越來越多後，他的信心大增，更加廢寢忘餐地栽進攝影的興趣中去。那時他甚至把家裏簡陋的洗手間改裝成“黑房”，晚上下班後十時起便蹲在“黑房”放相，一直至凌晨三、四時也毫無倦意。到早上天氣好時，又上街找拍攝題材去。

1963年，鍾文略離開工作了七年多的灣仔國民戲院，並由國聯電影公司的李翰祥導演介紹，轉職電懋影業公司負責拍攝電影劇照。在影業公司工作這兩年可算是他人生最艱苦的時期。當時他初入行，對行內情況完全不了解，而且家裏有太太和四個子女要照顧，全部重擔就落在鍾文略一人的肩頭上。那個時候片場不認人，因此縱使鍾文略手執兩個攝影名銜，仍要遵從行規，拍戲時每收到通告便務必準時在場守候，並且寸步不能離；如果碰上導演趕拍攝進度，更要長駐片場，有家歸不得。有一次，導演在拍攝完畢才想到要補拍用來印刷海報及宣傳廣告的彩色硬照，怎料拍了一張後演員們已嚷着要離開，好不容易令各演員多留一會，補拍一張，至完成時各人都急着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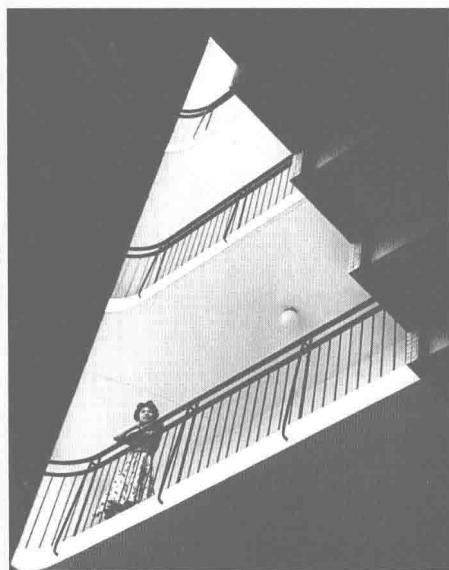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《眺望》



圖4《眺望》



“全副武裝”的鍾文略拍攝外景。



鍾文略拍的照片大部分攝自這部Rolleicord相機，到晚年已傳給其大兒子鍾燦光。

開，走晚一步可是連工廠車也不等他，這令鍾文略甚是狼狽。那時任職拍攝劇照的攝影師還需要侍候明星拍攝造型照及生活照，以供畫報用作宣傳。當時等候明星化妝、換衣服時也不能走開半步，於是常常空着肚子工作，卻練就了他一個可以捱餓的“神仙肚”。同年，鍾文略並擔任《攝影新潮》的雜誌主編，跟攝影同好互相交流。

1968年，離開了電影公司的鍾文略，踏入另一個重要的人生階段——開始建立自己的攝影事業。他在北角英皇道華豐國貨旁一條巷內的一間小舖，經營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影室，專職人像攝影、廣告及沖曬放大照片等業務。當時因為懂得專業攝影的人不多，影室的業務迅速發展，不久後又開了以太太的名字“愛玲”命名的第二家影室。隨着業務蒸蒸日上，他其後再於北角新都城大廈開設大型的“鍾文略影室”，那時是其攝影生涯的一次高峰。

從事攝影及相關工作五十多年後，鍾文略於1991年正式退下來，但他卻退而不休，並開始整理自己數十年來拍下的香港風景及人物，在香港和內地舉辦了多次作品展覽，同時出版多本個人影集，包括《從業餘到職業》、《戰後香港軌跡——社會掠影》、《戰後香港軌跡——民生苦樂》、《香港不了情》、《歲月留痕》、《往事只能回味》等，除總結自己的攝影生涯外，也喚起香港人對往昔社會的懷緬。鍾文略更飲水思源，在家鄉新會縣與當地攝影團體致力傳授攝影技術及組織交流活動，讓這門藝術傳承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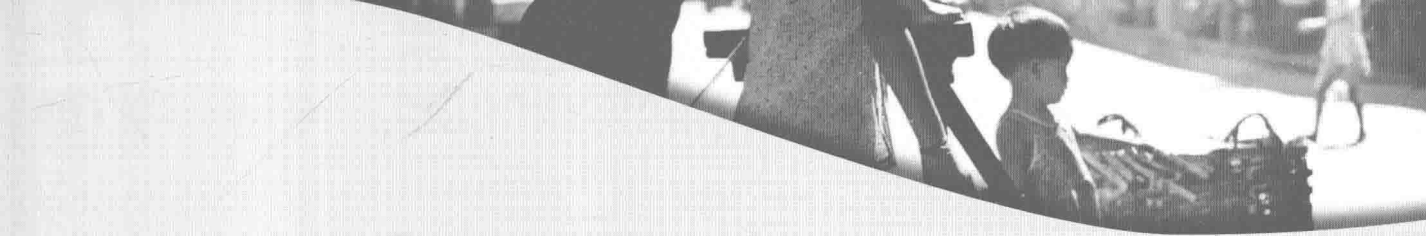
鍾文略社會題材的相片，把社會形形色色的影像，濃縮成他鏡頭下一瞬間的歷史，每幅相片的主題鮮明而突出，是該時代現實生活的寫照；構圖優美之餘，也帶有濃厚的氣氛。

鍾文略為人重視細節，是嚴謹和細心的人，對藝術也有一份鍥而不捨的追求。其兒子鍾燦光憶述，父親每逢社會上出現各種動靜大事，都會拿起照相機，奔到新聞採訪的最前線；而為了捕捉一瞬即逝的優美畫面，甚至不眠不休，數天不回家的在現場等候，直至拍到為止。

1999年，香港攝影學會表揚鍾文略在攝影方面的造詣和成就，授予其榮譽高級會士（HonFPSHK）名銜。鍾文略晚年居於志蓮淨苑，閒時亦有作畫，而提起攝影，他還是侃侃而談，如數家珍，彷彿攝影已成為他生命中的全部。



鍾文略暮年，攝於九龍志蓮淨院。



艱苦歲月

日治的三年零八個月艱苦歲月，迫使大量香港居民逃難到內地，當時香港人口由 180 萬銳減至 60 萬。戰後初期，香港經濟秩序一時難以恢復，加上人口急升，令社會負擔百上加斤。1951 年，戰後新生代加上從內地湧港的新移民，令香港人口突破 200 萬大關。木屋、蓬屋（用草搭成，到六十年代才絕跡）和天台屋，成為大批貧民的落腳點。

香港政府面對經濟失調、人口暴升，似乎無意改善。當時的保安司、後來的港督戴麟趾（Sir David Trench）辯稱：“政府無法確定難民是否將會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（所以政府不適宜插手干預）。”

明顯地，“社會福利”的概念當時並不存在。戰後的香港新人口，可能對香港並無歸屬感；同樣，當時的香港政府亦未必對本地事務認真投入。畢竟，香港是“借來”的地方。

及至五、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如《父與子》（1955 年）、《人海孤鴻》（1960 年）、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（1960 年）等，多反映戰後家庭艱苦的生活：一家人離鄉別井，沒有親友的幫助；父親為了養活一家，不惜出賣自尊，母親也捱得指頭破，就連小孩子也要承擔一份。有時他們還要賺點錢幫補開支，家裏頓成了小型工場。

六十年代，香港經濟從蕭條到繁榮，是這個時代最值得驕傲的轉變。由內地南下的資金和技術，韓戰、越戰及禁運帶來的契機，使香港轉化成工業城市。1960-65 年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 13.6%，位列發展中地區之首。不過，在 1967 年，中、英雙方的對抗曾一度激化，令社會短暫陷入混亂。

除了經濟環境改善，在港出生的戰後第二代，亦使香港變得更具本位意識和更加年輕。他們對香港較上一代更有歸屬感，同時亦較能接受外界的新事物、新潮流。《七十二家房客》、《人海孤鴻》等早期電影記載的艱難歲月，此時漸被蕭芳芳、陳寶珠的《我愛阿哥哥》和《玉女添丁》等歡樂青春片所取代，這種轉變正是時代的真實寫照。

同時，政府在民生及社會事務中的角色亦有所改變。1958 年社會福利署成立，1971 年“公共援助計劃”正式推行，社會福利漸漸從志願機構轉到政府身上。六十年代廉租屋興建，以及“新市鎮”和“衛星城市”計劃，亦是由政府策劃。至七十年代的“香港節”、教育市民清潔的“捉垃圾蟲”運動和宣揚交通安全的“馬路如虎口”運動，都表現出政府增加對社會事務的承擔。